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3.06.012

从文道之辨到文集校勘

——北宋前期韩愈文集传播论略

宿美丽,赵娟

(山东警察学院 公共基础教研部,济南 250200)

摘要:北宋前期,柳开、王禹偁等人继承韩愈儒家道统之说,对文与道两者的关系进行探讨,从创作、理论两方面扩大古文的影响;道教学者种放、佛教高僧智圆亦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在其作品中表现了对韩愈的高度认同。随着韩愈文集的广泛流传,文人学士对文集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韩愈文集的校勘也日益增多,而每一次校勘都称得上不同版本的韩愈文集的聚合、流传。韩愈文集的传播,不仅有助于加深时人对古文的理解,而且为古文运动的成功培育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关键词:文道之辨;韩愈文集;传播;北宋前期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3)06-0081-08

在北宋全面复兴中唐韩柳文风的过程中,韩愈的文章一直起到引领和标杆作用,所以,考查韩文在北宋前期的传播情况,有助于探究北宋古文运动的发展轨迹,对深化认识北宋古文运动的特征不无裨益。欧阳修成为古文运动的号召者,正是因为宋代开国70多年,以韩愈文集为主要学习内容风气的形成,培育了学古的文化土壤,欧阳修才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从而开创古文时代。

一、以“道”为重心的韩愈文集传播

历代史家大都视柳开为北宋号召古文第一人。柳开学习韩文在北宋颇具代表性,他的学习顺序为儒经——韩文——自作古文。也就是说,他先学习儒家经典后学习韩文,所以他对韩愈文集的关注点始终不离开“道”。柳开能在北宋第一个实践古文,很大程度上来自家庭的影响。柳开自传《东郊野夫传》云:“始年十五六,学为章句。越明年,赵先生指以韩文,野夫遂家得而诵读之。”^{[1]15}有了儒家经典的基础,柳开17岁从天水宿儒赵先生学习韩文。当时正值北宋刚刚建立声律之文盛行之时,柳开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不顾世俗,向熟悉韩文的赵先生就学,应该归于父亲

柳成翰的选择。柳成翰五代时从万俟生学文章,显示了柳开家族对古文的偏好。所以,赵先生指授柳开韩文,得到了父亲柳成翰的默许和支持。柳开回忆当时学习韩文的状况:“但朝暮不释于手,日渐自解。先大夫见其酷嗜此书,任其所为,亦不责不可于时矣。”^{[1]15}从柳开的描述看,他当时倾心于韩文,并没有因不合科举要求受到父亲的批评。

经过夜以继日的诵读,柳开开始模仿韩愈之文。柳开17岁时,正值柳成翰任监察御史,柳开随父任居于汴京。当时北宋初建,科举应试依然以四六文为主,而赵先生在此时向柳开指授韩文几十篇,可见赵先生在科举之文和韩文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赵先生指授的韩文,应该不是单篇文章的形式,而是以文集的形式传播。从文章的数量来看,这个文集不是唐代潮州人赵德编的《昌黎文录》,而只能来自于唐代李汉为韩愈编定的《昌黎先生集》。根据李汉的《昌黎先生集序》,韩愈共有诗文各300余篇,而《昌黎文录》以诗为主,所以,柳开最早见到的韩愈文集应该来自唐至五代的流传。

赵先生指授的几十篇韩文成为柳开理解韩愈

收稿日期:2023-08-24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阈下人民警察职业素养提升研究”(19CJYJ19);山东警察学院人文社科计划项目“儒家思想对提升新时代公安民警职业素养的启示研究”(YSKYB201707)

作者简介:宿美丽(1971—),女,山东莱州人,山东警察学院公共基础教研部讲师,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赵娟(1979—),女,山东邹平人,文学硕士,山东警察学院公共基础教研部讲师。

的起点,获得了对韩文的“自解”能力之后,柳开用7年时间校订了韩集,并作《昌黎集后序》。据南宋方嵩卿《韩集举正》,柳开对韩集删减5758字之多,而柳开“笔削其韩文之繁者”^{[2]156}的结果,因为未能谨严而大部分为方氏所不取。

柳开在973年登进士第,《昌黎集后序》写于970年,可见他在进士及第之前,文风已经形成。柳开学习韩愈重点在道统方面,文道合一的观点贯穿于其早年和晚年的文章中。他称赞韩愈的文章取法六经,成就超过了孟子和扬雄:

观先生之文诗,皆用于世者也。与《尚书》之号令,《春秋》之褒贬,大《易》之通变,《诗》之风赋,礼乐之沿袭《经》之教授,《语》之训导,酌于先生之心,与夫子之旨无有异趣者也。先生之于圣人之道,在于是而已矣。^{[3]155}

柳开将韩愈诗文抬到六经的高度,显示对韩愈的儒道观念的推崇。他特别看重韩愈的经世之文,标举“录顺宗,纪淮西,谏佛骨,碑罗池”^{[4]65}作为韩文代表,于韩愈复兴儒道的文章内容倾向十分明显。他认为只要体现了古圣贤之“道”,文自在其中,甚至批评韩愈“韩氏有其文,次乎下也”^{[4]65},认为韩愈的文辞之作有“害道”的不良作用。这种传道文风的形成,是在对韩愈儒道之说的理解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需要建立起来的。他特别推尊韩愈文集中“讽诵规戒,答论问说”^{[3]157}一类的文章,因为这类文章能够集中体现“道”。

柳开这种文道合一,以道统文的观点在宋初得到传播,与他同声相应的主要是当时由后周入宋的文士。五代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频繁,公私藏书遭遇兵燹,百存二三,但韩愈文集却奇迹般的完整流传下来,《旧唐书·韩愈传》记载韩愈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序。这是李汉为韩愈所编的全集本。根据史传记载,后周冯胤孙学韩愈为文,可见当时文士读书的偏好

柳开交往的文士当中,由五代入宋的包括王祐、高赐、范皋、梁周翰等人。王祐先后仕后晋后周北宋三朝,喜欢拔擢清俊之士,宋初颇具声望,受到编纂《太平御览》的徐铉称赏。王祐文章多四六体,但他的骈体文不是一味追求辞藻,与韩柳古文一样,追求“不悖圣人之道,以成天下之务”^{[5]230},是“文以载道”的观念在骈文领域的实践者之一。在乾德年间,柳开还未取得进士科第,

向王祐贻文五次,不但“大蒙赏激”,而且获得了“褒扬之赐”,王祐称赞柳开的文章是“真古之文章也!”^{[6]355}王祐的评价大大提高了年轻的柳开在当时的影响力,“由是学者益大信于公。”^{[6]355}王祐跳出了当时流行文体的局限,对柳开文章以散体形式直接与古之文联系在一起,意味着他肯定柳开学习韩愈的成果。王祐的文体不类古文,但他对“文以载道”的运用以及对柳开文章的评价均证明他对韩愈文章的熟悉和认可。

据《宋史·梁周翰传》记载,高赐、梁周翰、柳开、范皋在宋初“习尚淳古,齐名友善,当时有高、梁、柳、范之称。”^{[7]13002}高、梁二人均在五代登第,仕于后周,在宋初同柳开一样慕古道、习古文,其文应该与柳开有不少相通之处。梁周翰曾与柳开书信往还,“指摘韩氏之疵”^{[4]65}。范皋与柳开相善,在提升柳开知名度上尤其用力。柳开门人张景叙述说:“方好古学,少有大名,特爱公文,常口诵于朝野,为公之誉,世因称为柳、范。”^{[6]353}从四人的交往情况来看,他们作为当时偏好古文的同道者,爱好韩愈文章应该是其共同的底色。

除了交游的同道之人,当时向柳开问学的人超过200人。如门人张景、高弁、臧丙、李迪等,有姓名可考的尚有马应昌、韩洎、高本、任唐征、李宪等人。张景20岁之前通“艺文”,可见他是学骈文出身,不久主动从柳开学古文,柳开“一见欢甚,悉出家书畀之”^{[8]1973},柳开送给张景的书应该包括柳开校订的韩愈文集。除了赠书之外,柳开与后学书信赠答,多以“古文”“古道”进行劝勉,对后进学韩的努力和成果加以充分肯定。范仲淹称赞柳开及其门人对文风的影响说:“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9]183}柳开通过门人后学的影响力,从横纵两个方面扩大和延续着韩愈文集的传播。

二、“文”“道”并重的韩愈文集传播

王禹偁少学元白诗,“志学之年,秉笔为赋”^{[10]14},15岁即开始作赋,为他的科举之路打下良好的基础。王禹偁的学习经历与柳开不同,决定了他对韩愈文集的传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王禹偁出身贫寒,因济州团练推官毕士安的帮助得以继续学业,毕士安因词章之学而赏识王禹偁,“留王禹偁于推官廨中,使治书学为文”^{[11]117}。从毕士安的推官府到进士及第的十多

年时间,他开始接触、学习韩愈文集。首先,毕士安的济州推官府是当时有名的藏书之所,毕士安是北宋初年著名的藏书家,“读书不辍,手自讎校,或亲缮写”^{[12]9553};其次,毕士安虽以辞藻见称,但好友如王祐、王旦等人都好古学,推官府也应该是古文的交流中心,王禹偁很有可能在府中就可以读到韩愈文集。王禹偁有一段长达十年的游学时光,与他交往的人士有冯伉、臧丙等人。冯伉,南唐进士,宰相冯延巳之侄,李璟在位之时,南唐已经有了韩愈文集,南宋方嵩卿还曾见过保大本的韩集,虽然卷帙残缺,但从仅存的卷目数量来看,南唐保大本应该与李汉原本没有太大出入。南唐进士出身和接近皇权的显赫家族让冯伉完全有可能获得阅读韩集的机会。臧丙是柳开的学生。王禹偁与当时好古之士的交往,也大大提高了其接触韩愈文集的可能性。虽然王禹偁学习韩愈文集的时间和地点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王禹偁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来到京师,行卷于知贡举的宋白请求延誉之前,已经对韩愈的道统说了然于心。他的《投宋拾遗书》说:

某尝谓书契以来,以文垂教者,首曰孔孟之道。……孟柯氏没,扬雄氏作。……扬雄氏丧,文中子生。……文中子灭,昌黎文公出……下韩氏二百年,世非无其文章,罕能聚徒众于门,张圣贤之道矣!其或者复授于明公乎。明公履孔、孟、扬雄之业,振仲淹、通之之辞,矧天与其时,身得厥位,则追还唐风,不为难焉。^{[13]424}

王禹偁的上书从内容和方式两方面继承和深化了韩愈的道统,由此看出作者对韩文的精研程度之深。王禹偁步入仕途之后,很快凭借创作巩固、扩大了韩文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王禹偁通过京城、地方18年的任职经历,特别是三掌知制诰的京城任职经历,改变了之前韩文以地方为主的传播范围,提升了韩愈文的传播层次。

文士创作、交游对文集的传播效果更为直接。王禹偁与同门进士田赐、罗处约等人交游唱和,往往以韩柳古文为中心。田赐出自宋白门下,早王禹偁5年中进士。他认为“韩退之、柳子厚,萌一意,措一词,苟非美颂时政,则必激扬教义”^{[14]121}。韩柳文的价值在于“识者观文于韩柳,则警心于邪僻”^{[14]121},将文风与时政联系起来。同时,田赐也认同自孟子到韩愈的统系,虽然田赐的统系与

王禹偁略有出入,但两人对韩柳文的认同是相同的。王禹偁与罗处约同年,两人诗作多有唱和,诗风近似,如果有散文传世,应该文风接近。遗憾的是罗处约早逝,又加上作品散佚殆尽,无法确论。

孙何,淳化三年(992年)状元及第。早在初次任知制诰时期,王禹偁就为汲汲无名的孙何延誉,称颂孙何的文章:“落落然真韩柳之徒也。”^{[15]424}孙何继承韩柳文传统,王禹偁的主要立场在于孙何的文章能够“服勤古道,钻仰经旨,造次颠沛,不违仁义,拳拳然以立言为己任”^{[15]424},体现儒家之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禹偁将孙何的文章放在唐末五代“斯文不竞”的历史背景下,称赞孙何是真正的君子之儒,“宜其在布衣为闻人,登仕宦为循吏,立朝为正臣,载笔为良史,司典谟,备顾问,为一代之名儒”^{[15]424}。将孙何通经服古的文风与人品联系起来,在宋初身体力行儒家之道,显得尤其难能可贵。孙何在自己的文章中,确实大力推崇孔孟荀扬诸儒,他推崇韩愈其人其文也从其“好古”的一方面来着眼。后来,王禹偁以儒者身份站出来反对京城盛行的佛教思想,孙何坚定地站在王禹偁一边,证实了王禹偁对孙何“韩柳之徒”的判断。

丁谓,当时与孙何齐名,有“孙丁”之称。司马光说:“孙何、丁谓举进士第未有名,翰林学士王禹偁见其文大赏之,赠诗云:‘三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好合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二人由此诗名大振。”^{[16]39}王禹偁将孙丁二人比作韩柳,可见丁谓文章的古文风范。在《送丁谓序》一文中,王禹偁评论“其文数章,皆意不常而语不俗,若杂于韩、柳集中,使能文之士读之,不之辨也”^{[17]425}。根据王禹偁的评价,丁谓诗风接近杜甫,文章类似韩柳揭露时弊的文风,其《书异》一文被吕祖谦选入《皇朝文鉴》得以保存。此文作于丁谓未中进士之前,作者站在“为政”的立场,大胆揭露了任职官员之弊,在宋初卑弱的文风之中,显得卓尔不群。

除了孙何、丁谓,当时的青年人每天登门求教的很多。根据王禹偁自述,这些士人“日以文湊吾门”^{[18]393},以致“岁不下数百人”^{[18]393},有姓名可考的有郑褒、黄宗旦、朱严、张扶、赵湘、孙仅、江翊黄等人。王禹偁对这些后学的文章有一个评价标准,就是韩柳文,他在给郑褒的信中说:“今携文而来者,吾悉曰韩柳也”^{[17]425},显然是一句表达对自己无辜遭贬的不满之言,但阅读了后学的文

章,他还是根据事实做出了判断,如他评价朱严的“韩柳文章李杜诗”,称赞郑褒的文章“辞甚简,理甚正”,“真得古人述作之旨耳”^{[19]759}。他称赞江翊黄“好古近道,趣向不俗”^{[20]399},向同僚推荐丁谓时也用“其文类韩柳”这样的褒扬之语。这些评语表明王禹偁已经将韩柳古文作为文章的评价标准。

具体说来,韩柳文的标准,就是传道明心与易道易晓。传道,显然是古文家常见的立论基础,王禹偁解释“道”为“修身则无咎,事君则有立”^{[21]395},从道的功用树立儒家之道的立场。但王禹偁并不像柳开那样将重心放在阐述“道”,而是强调传道的重点在于“明心”。文章是“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如此一来,为了“明心”,文章必然要避免“句之难道”和“义之难晓”。王禹偁又以六经和韩愈文为例,来证明文章要易道易晓。他说:“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吏部而已。吾观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难道也,未始义之难晓也。”^{[21]395}易道易晓,从文章语言的角度入手,只要语言通俗,自然明白晓畅。从语言发展的角度,《六经》在著作年代是易道易晓,在后世人的眼中,却变成了佶屈聱牙的语艰义涩,如果仅仅从字句上进行模仿,必然会造成一味模仿古语古字的“文之弊”,导致文章难以诵读,茫然不知其意。王禹偁剀切建议张扶学习古文的途径是“远师六经,近师韩吏部”^{[21]395},特别是韩愈文集,无论是著书立言,还是“应事作俗”,都是必不可少的范本。王禹偁正是继承了韩愈学古而不机械仿古的作法,不但自己创作出平易自然、朴素流畅的散文作品,而且提倡以韩愈文章为指引,劝导后进们将古之传道和今之通俗结合起来,矫正了柳开为代表的古文作家重道轻文的不足,开辟了古文运动发展的建康之路,同时也进一步深化了士人对韩愈文的认知。

三、佛道两家对韩愈文集的传播

(一)种放对韩文的传播

种放亦隐亦道,有“关西夫子”之称。他随母隐居终南山中,以讲习为业。其讲授活动吸引了当时秦、蜀、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学子远赴千里就学,讲授的内容除了儒家经典之外,还选自扬雄、王通、韩愈、刘蛻、孙樵、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文章,编为古文,务使“句句明白……使学者窥之,则有列圣道,德仁义之用”^{[22]565}。种放认为当

时流行的“刻章断句,补缀偶属”^{[22]565}的文风是一种徒劳的文字游戏,可见他是站在儒学复古的立场上反对骈偶的文风。种放所编的古文虽然不见流传后世,但当时向其学者都受到沾溉,向柳开学习古文的高弁、李迪都曾问学于种放,种放称颂高弁的文章为“隋唐以来,缀文之士罕能及之”^{[23]70}。可见他与同时期的王禹偁一样,以古文的标准要求后学。穆修在真宗朝中后期以古文名世,宋人记载均称穆修从种放学《易》,未有学习古文的相关记录,穆修自称自己的古文来自于“少嗜观二家(指韩柳)之文”,四库馆臣称赞他“天资高迈”,但后来向穆修学《易》的李挺之,学《春秋》的尹洙兄弟都成了当时的古文家,可见,在儒家经典的传承过程中也会涉及到古文的学习。所以现代学者钱穆推断穆修古文受种放启发,不无道理。

王禹偁评价隐士种放的事迹“行是有余力,稽古且学文”^{[24]803},这两句诗概括了种放授徒内容的两个方面:从儒之道来说,他勾画了从孔子、颜回、孟子、扬雄、王通、韩愈的儒家道统,尤其推重韩愈,韩愈的贡献在于“斥释氏,续颓纲,俾忠恕之道焕然如日月之明”^{[25]219},对儒道的贡献尤大,并专门作《嗣禹说》表彰韩愈辟佛之功;从文之道来说,他对侧重于议论的古文更为偏爱,除了韩愈之外,还增加了晚唐五代的一些散文作者,扩大了学习古文的视野。当时泰山学者孙复将种放置于古文传承谱系当中,渊源应该自此。

与柳开、王禹偁相比,种放以隐士的身份博古通经,在空山穷谷中学习儒家之道,传播古文,以学问为根基,在北宋书院重建之前,开启了一种以山野身份的儒道传播方式。虽然种放在真宗朝接受征召出仕,并因广置田产,纵酒盛舆服为士林诟病,但不能否认他在书院建立之前对北宋古文传播的贡献。

(二)智圆为代表的佛家对韩愈的推重

种放在真宗前期以亦仕亦隐的身份继续从事儒学复古,其《嗣禹说》引起了释智圆的注意,并作《驳〈嗣禹说〉》给予回击。智圆的反驳仅在于种放文章本身的论据,他对韩愈“空言排佛”表示遗憾,认为韩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力谏佛骨、忤逆皇帝遭到远贬,并没有遏制佛教的传播,语气中颇含有“韩愈斥佛理所固然”^{[26]590}的意思。在《师韩议》中更明确指出韩愈作为儒家弟子,“摈黜释老百家之说”^{[27]163}是应该的,合理的。因此

著名学者罗根泽认为智圆的文章不但没有批驳韩愈,反而对韩愈推崇备至,表现了智圆对儒道的认同。

通过《读韩文》《述韩柳》诗文作品可知,智圆看到的是韩愈文集全本。“高文七百篇,炳若日月悬。力扶姬孔道,手持文章权,来者知尊儒,孰不由兹焉。”^{[28]164} 这些诗句对韩愈文集的内容,韩愈对儒道的贡献,对文章的引领作用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从文、道两方面推崇韩愈的贡献,这是宋代儒学复古者常见的做法,智圆更大的贡献在于他是在北宋第一个明确指出韩愈文集的作品数量的学者。韩愈文集的第一次编集在唐朝,根据编者李汉的记录,韩愈的所有体裁作品“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29]3},智圆称看到韩愈“高文七百篇”,明显就是韩愈全集。智圆8岁出家,先居于杭州龙兴寺,后居于孤山玛瑙院,一生没有离开寺院,但得见韩愈全集,可见当时的杭州寺院藏书丰富。智圆看到的韩愈文集,极有可能是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明教寺印本,该本是方嵩卿校勘韩集所依据的主要版本之一。

作为佛教徒,智圆以韩文为学习对象,需要对韩愈的排佛做出合理的解释,为此,他在《述韩柳》试图证明韩愈文章并没有“儒”与“释”的对立。他在诗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柳宗元并尊儒道与释氏,韩愈与柳宗元是同道人,韩愈出于捍卫儒家的需要而反对佛教,其排佛立场并非出自本意。加上韩愈重视墨子,墨子持“兼爱”说,既然如此就不会真正疏远释氏。智圆充分肯定韩愈退尊儒道的作法,并且建议僧人也像韩愈一样。“释子果能师韩也,则盖演经律以为文,饰戒慧以为行,广慈悲以为政,使能仁之道巍巍乎有功,则可谓之师韩矣。噫仲尼之于吏部犹如君父也,能仁之于沙门,亦君父也。”^{[27]136} 韩愈反对佛教是为了推尊儒道,佛教徒应该如同韩愈一样忠于师道。无论是引入柳宗元做类比,还是特别指出韩愈尊墨家,都在为韩愈排佛做出回护,强调了韩愈的儒家立场。

四、韩愈文集的校勘

随着北宋文治的深入和制度化,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书籍的数量大增,促进了读书之风的兴盛,书籍的收藏和校勘之风大盛。随着阅读的增多,读书人对韩愈文集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太祖一朝,校勘韩愈文集的只有柳开一人,到真

宗、仁宗朝从事韩集校勘的人数大大增加了。随着阅读重点的转向,这一时期的读书人较少关注文、道之辨,而将更多精力用于校勘文集,访求佚文以便不断补充、完善韩集。

姚铉在真宗朝编成《唐文粹》,收录韩文64题83篇。姚铉专设“古文”一类,共收入唐代作家35位,作品189篇,其中韩愈的作品16篇。这个收录数量虽然次于皮日休,却居于类目之首。《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并称“五原”,表现了他对韩愈首倡儒家道统,开创古文运动的充分认同。在序言中,姚铉称赞韩愈对儒家道统的继承和开创作用:“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轹轳,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悬诸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杨孟,斯得之矣。”^{[30]1} 这段序文也可看做对“古文”所承载的儒家道统的阐发,显示了他文道并重的观念,可以看出同年进士王禹偁的影响。

《唐文粹》虽然选录韩文较《文苑英华》少,但与《文苑英华》编成后久在秘府不同,其个人编写的性质使它很快在民间得到传播。稍后大力提倡儒家道统的石介即将其与《昌黎集》等量齐观,通过《唐文粹》以及《昌黎集》获知“三代制度,两汉遗风”^{[31]136}。《四库全书总目》称姚铉通过《唐文粹》“矫五代之弊,与柳开、穆修相应”^{[32]1692},都指出了唐文粹通过韩文的传播对古文复兴作出的贡献。

最早完成韩集校勘的是刘焯,刘焯本韩集增加了外集篇目,并校订了韩集。刘焯出身洛阳世家大族,十二世祖刘环俊任职北齐,家族谱牒至元朝人修《宋史》时仍然可见。尹洙为刘焯作墓表,记述其少年时代就能为古文章,进士及第在真宗朝任职馆阁,有机会见到国家藏书,个人的爱好和任职环境为其校勘韩文提供了动力。刘焯的校勘本以收录全面见长,在常见的四十卷本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外集38篇。刘焯本韩集在北宋中期秘阁本韩集印成之前,一度十分流行。

从穆修对韩愈文集的校勘过程中可以看出此时韩集的传播范围之大。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称:“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33]124} 穆修在真宗朝提倡古文,在西昆体盛行的文风中独树一帜。张景曾问学于柳开,相同

的爱好使二人同声相应。穆修在《与乔适书》中批评“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靡有异途焉”^{[34]413}。他以古文为业,表达遵从仁义之道而不慕爵禄的观点,可以看出与其师种放的承继关系。向穆修学习古文的苏舜钦评价其文章“深峭宏大”,这是指他的阐述儒家之道的古文。由于穆修生前没有编集,死后文章大量散佚,无法获知这部分内容,但从流传到今天的文章看,畅达平易是其显著的文风。

穆修自述少年时期嗜好儒学,不爱章句,不喜骈偶,从穆修学者苏舜钦兄弟、尹洙等后学诗文均擅名一时。穆修终其一生,以学习韩文为业。根据穆修自述,他“少嗜观二家(韩柳)之文”^{[35]423}他看到的韩集虽然号为全本,亡字失句却十分严重,所以历时二十多年,先后用十几本韩集补正、窜注,得到韩集善本。

穆修的《唐柳先生集后序》一文,记叙了他对韩愈文集的校勘过程,他将韩文集与柳宗元文集进行比较之后,得出二人文集“巨文”的结论。从序文来看,穆修将二人文集合刻出售。根据苏舜钦《哀穆先生文并序》的记载,穆修只刻印柳宗元文集,并未提到韩文。《东轩笔录》也只说穆修“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36]30}。这次售书的结果并不理想,苏舜钦说“值售者甚少,逾年积得百缗”^{[37]136}。《东轩笔录》认为“经年不售一部”,这些记载都通过书籍的销售印证一点,直到北宋建国60多年,古文也没有我们现代人想象的那样普及。从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开始,将韩柳文集并称,“欲二家文集行于世,乃自镂板,鬻于相国寺”^{[38]142}。这是明确指出穆修刻书是韩柳二人文集合刻的开始。根据南宋刊刻《新刊训诂唐柳先生文集》《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书中均包括韩柳二集,南宋人在标题柳集中刊刻韩集的作法应该来源于穆修。

蔡齐校订韩集采用了唐令狐氏本。这个唐写本由令狐绹在咸通十一年(870年)写成,只有诗赋十卷,辗转至北宋蔡齐收藏,蔡齐曾用来校正全本韩集,这个韩愈文集本至南宋仍然可见。蔡齐是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状元,与范仲淹布衣交,同年登科,二人都笃志力学,趣味相投。蔡齐校订韩文集,为之作墓志铭和行状的范仲淹和欧阳修都不见记录,北宋吕夏卿校订韩集曾引述

十条。

晏殊名列“评论训诂音释诸儒名氏”之列,魏仲举刻印《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特别下“名殊,字同叔,校定韩文”^{[39]236}一语,可见晏殊对韩文校勘下过一番功夫。又编《集选》100卷,收录有韩愈作品。晏殊博学能文,笔耕不辍,今有《类要》《集选》残卷存世,晏殊喜爱奖掖后进,拔擢人才,门生欧阳修、范仲淹为一代名臣。

范仲淹以道德文章、责任担当为后世楷模,他一生出将入相,勤于国事,为教化世道人心主张文章要通过“兴复古道”,以达到“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40]200}的目的。他在《尹师鲁河南集序》中,充分肯定韩愈通过古文复兴古道的首创之功,称赞师友尹洙在西昆体盛行之时“立为古文”,从而大变文风,深于古道。直到北宋中期,仍楷书韩愈《伯夷颂》,以古贤节义激励。可见范仲淹对韩文承载的儒道精神始终关注如初。

西昆体诗人钱惟演,也有韩文集“钱思公家本”传世,南宋方嵩卿《韩集举正》曾采用三条,今已散佚不见。钱惟演被视为西昆体代表诗人,以博学能文著称。钱思公家本,顾名思义仅在家族成员内部流传,钱惟演传世的作品中没有颂扬韩愈的文字记录,但家本流传这一行为表现了他对韩愈文集的重视,他的校勘成果被采用,证明对文集也曾下过一番功夫。钱惟演一生酷爱读书,家中藏书丰富,“家储文籍侔秘府”^{[41]10341},韩愈文集就是其中藏书之一。

钱惟演曾任西京留守一职,在他治下西京幕府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和文人交往的中心,欧阳修称赞说:“河南吏属,适皆当世贤材知名士,故其幕府号为天下之盛。”^{[42]321}当时任职的除了欧阳修,还有尹洙、梅尧臣、谢绛等文士,除了经常饮酒赋诗,欧阳修的古文写作在这里获得了“一日千里”的进益。也是在此时,欧阳修和尹洙开始校订韩集,成为他领导不久之后古文运动的基础。

欧阳修少年时代就读过韩文,他看到的韩文集只有六卷残本,却是欧阳修学习韩文的起点。进士及第之后,他首任西京留守推官,才开始古文写作,并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张元干记录欧阳修从学习韩文到写作古文的过程说:“庐陵欧阳文忠公初得退之诗文于汉东弊篋故书中,爱其言辨意深,已而官于洛,乃与尹师鲁讲习,文风丕变,浸近古矣。”^{[43]155}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

记述自己儿童时期从随州李彦辅家得《昌黎先生文集》六卷,“尚未能究其义”^{[44]488}。欧阳修 17 岁时,第一次参加科考失败,拿出儿时所藏韩文集“复阅之”,树立了韩文的学习榜样。欧阳修 24 岁进士及第,入职西京留守推官,与“尹师鲁相与作为古文”,获得了尹洙“一日千里”的称赞。随着创作的深入,欧阳修还对自己的残本韩集进行了校订和补缀。古文盛行之后,“韩文遂行于世”^{[44]488},虽然能见到的韩愈文集日渐增多,但直到晚年,欧阳修所藏之书仍然是在当年的六卷残本基础上的修订补缀本。

欧阳修之所以始终保存这个残本文集,是因为就当时所见来看,这个六卷残本颇具有藏书价值,“集本出于蜀,文字刻画,颇精于今世俗本,而脱缪尤多。凡三十年间,闻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后卷帙不足,今不复补者,重增其故也”^{[44]489}。这段追记,指出了经过补缀、校订的集本的特殊价值。同时,欧阳修也有全集本流行于世,苏溥在北宋中期刻印韩昌黎文集,采用过欧阳修、尹洙二人校订的韩愈文集,称为欧、尹二学士本。欧阳修对此颇为自豪:“自天圣以来,……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45]2270}

欧阳修在嘉佑二年(1057年)知贡举,标志着古文运动的最终成功。在此之前,韩愈树立的儒家道统和文统成为北宋复兴儒学、巩固中央政权的有力工具。柳开第一个提出复兴古学,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柳开有任气好侠的气质,校勘韩愈文集不免出现以己度彼的短处,却首开北宋校勘韩集的潮流。王禹偁虽没有从事直接的校勘工作,但是他对北宋古文运动的文风盛行有直接影响,关于古文的主要观点受到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推崇。他通过直接创作、奖掖后进,品诗论文诸方式扩大韩愈文章的影响力。道释两家人物同样儒学修养深厚,构成前期韩文传播的重要一环,也显示了韩愈文章的影响力。随着韩愈文章影响的不断深入,对韩愈文集的篇目、字句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私人从事韩文校勘日益普遍。作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欧阳修认为“天圣以来,古学渐盛”^{[45]2270},这种时代风气的形成离不开此前学者的“拓荒”之举,同时,正因为“古学”表现出文道之辨、编集、韩文校勘多种形式,使古文获得了广泛的基础和坚实的阵地,才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参考文献:

- [1] 柳开. 东郊野夫传[M]//柳开集. 北京:中华书局,2015.
- [2] 柳开. 补亡先生传[M]//柳开集. 北京:中华书局,2015.
- [3] 柳开. 昌黎集后序[M]//柳开集. 北京:中华书局,2015.
- [4] 柳开. 答梁拾遗改名书[M]//柳开集. 北京:中华书局,2015.
- [5] 徐铉. 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M]//徐公文集. 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 [6] 张景. 柳公行状[M]//全宋文.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7] 脱脱. 梁周翰传[M]//宋史.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8] 宋祁. 张晦之墓志铭[M]//宋文鉴. 北京:中华书局,1992.
- [9] 范仲淹. 尹师鲁河南集序[M]//范仲淹全集.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 [10] 王禹偁. 律赋序[M]//全宋文.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11] 毕仲游. 丞相文简公行状[M]//全宋文.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12] 脱脱. 毕士安传[M]//宋史.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3] 王禹偁. 投宋拾遗书[M]//全宋文.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14] 田赐. 贻陈季和书[M]//全宋文.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15] 王禹偁. 送孙何序[M]//全宋文.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16] 司马光. 涑水记闻[M] 邓广铭,张希清,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7] 王禹偁. 送丁谓序[M]//全宋文.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18] 王禹偁. 答郑褒书[M]//全宋文.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19] 王禹偁. 赠朱严[M]//全宋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20] 王禹偁. 送江翊黄序[M]//全宋文.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21] 王禹偁. 答张扶书[M]//全宋文.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22] 种放. 退士传[M]//全宋文.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23] 王辟之. 澠水燕谈录:卷6[M]. 吕友仁,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4]王禹偁.赠种放处士[M]//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25]种放.辨学[M]//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26]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27]智圆.师韩议[M]//续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5.
- [28]智圆.读韩文诗[M]//续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5.
- [29]李汉.昌黎先生集序[M]//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30]姚铉.唐文粹序[M]//唐文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31]石介.上赵先生书[M]//徂徕石先生文集:第1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
- [32]《四库全书总目·唐文粹提要》。
- [33]沈括.梦溪笔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34]穆修.答乔适书[M]//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35]穆修.唐柳先生集:后序[M]//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36]魏泰.东轩笔录: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7]苏舜钦.哀穆先生文[M]//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38]朱弁.曲洧旧闻:卷四“穆修伯长自刻韩柳集鬻于相国寺”条[M]//孔凡礼,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2.
- [39]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40]范仲淹.奏上时务书[M]//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 [41]脱脱.钱惟演传[M]//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
- [42]欧阳修.河南府司录张君宋史汝士墓表[M]//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43]张元干.亦乐居士文集序[M]//芦川归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44]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M]//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45]欧阳修.唐田弘正家庙碑[M]//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

From the Differentiation of Literature and Taoism to the Collation of Collected Works: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Han Yu Collected Works i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SU Meili, ZHAO Juan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Public Basic Courses, Shandong Police College, Jinan 2502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Liu Kai, Wang Yucheng and others inherited the Confucian orthodoxy of Han Yu and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aoism, expanding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Chinese prose from both creative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aoist scholar Chong Fang and eminent Buddhist monk Zhi Yuan also had profound Confucian cultivation, and their works demonstrated a high level of identification with Han Yu. With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Han Yu Collected Works, the scholar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and its collation is also increasing. Each collation can be called the aggreg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ts different versions. The dissemination of Han Yu Collected Works not only helps to deepen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Chinese prose, but also cultivates deep cultural soil for the success of ancient Chinese prose movement.

Key words: differentiation of literature and Taoism; Han Yu Collected Works; disseminatio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责任编辑 隲 右)